

試論陳亮《龍川詞》的情感義蘊

林于盛*

【提要】

南宋陳亮《龍川詞》中的作品，其情感的內容有忠愛國家民族的情懷與文人日常生活的情致兩大類。前者情感的形式或橫肆激昂，或流緬悱惻。流緬悱惻者往往具有詮釋空間，而橫肆激昂者依其情感興發的外緣因素，則又有連結政治議論而發、緣附政治遭遇而生之微別，但皆非其政論文的簡單複製或摘要。簡言之，政論文與忠愛詞篇係各為議論與抒情之用，分別代表陳亮的理智之思與感性之情，同時又彼此互為根源。至於抒發生活情致的篇什，隨境生情，情感的具體內容雖不單一，情感的表現形式則皆傾向於幽秀妍麗。而綜觀《龍川詞》中的情感，一方面呈現一己生命的崇高與人性的生動豐富，足以滌蕩讀者心神；一方面又特具政治睿識，洞悉政權係建立於物質現實與文化認同之上，且具備對自身國族全然赤誠的政治人格情操，而為任何時代的政治人物所尤當注意講求者。因此，我們不能以為其婉麗之詞與豪放之詞相矛盾，亦不能輕言其情感不免在生命理境上有所不足，遂竟予忽視或貶抑。

關鍵詞：陳亮 龍川詞 情感 政論文

*東方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陳亮(西元 1143-1194)，字同甫，號龍川，才氣超邁，有志事功。他是南宋時代的思想家與文學家，著有《龍川文集》四十卷、《外集》四卷，《外集》皆為長短句，亦稱《龍川詞》。後來逐漸散佚，至明朝成化年間遂拼湊殘本為《龍川文集》三十卷，其中第十七卷收錄詞作三十闕，後人更輯補為七十四首^①。

學術界對於《龍川詞》的研究，雖然已在作者生平、作品輯佚與箋注有完整的考索^②，更進而分析《龍川詞》形成的歷史因素^③，討論其藝術技巧與風格特色、及其在詞史、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與意義^④，可是卻似乎鮮少針對詞中所體現的情感再加以更深入的觀察。然而詞作無非是詞人情志之所凝，情感實為詞作的核心。讀詞而輕輕放過其情，未免可惜。此外，學者們對於陳亮，主要的觀點有二：一是其對政治上王霸的判斷，頗有擡高事功之地位以凌越於道德義理之上，而逸出傳統典範；一則是其愛國詞篇極富激昂雄渾、直抒胸臆的特色，乃歸屬於南宋豪放詞派之一員。這兩者可謂已是學界的通識。然而似乎分別隸屬在思想史與文學史的議題、領域中，彼此稍嫌獨立^⑤。因此

① 關於陳亮生平，可見於元·托克托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436的本傳，頁12929-12943。今人又編有年譜，如顏虛心，《宋陳龍川先生亮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1980)；童振福，《陳亮年譜》(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而王叔珩還注，《陳亮政論詞選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頁1-17的〈代序〉則以辛棄疾〈祭陳同甫文〉為脈絡，頗為精當地述說陳亮的才華、心志理想、生平遭遇。至於陳亮著作的情況，可參考鄧廣銘〈陳龍川文集版本考〉，載於其所點校的《陳亮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27。而陳亮詞作的輯佚來源與繫年概要，則可參考姜書閣，《陳亮龍川詞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② 如前註中王氏、姜氏之書，及夏承燾校箋、牟家寬注，《龍川詞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③ 例如周聖偉，〈南宋豪放詞派形成的原因〉，詞學編輯委員會編輯，《詞學(第二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頁132-149；陳華文，〈論陳亮的文風與詞風——兼談陳亮獨特詞風形成的原因〉，《浙江師大學報(社科版)》1(1992):33-37、43等等。

④ 此問題就廣義之角度而言，涉及宋詞之發展史、詞之婉約派與豪放派的正變與優劣；就狹義之角度而言，則涉及陳亮詞自身之特點與其他詞人乃至與其他辛派詞人間之同異及影響。關於後者，初步可參考簡秀娟，「辛派詞人以文為詞之研究」(中壢：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3)；蘇淑芬，〈陳亮劉過詞比較〉，《東吳中文學報》4(1998.5):273-315；夏承燾，〈論陳亮的龍川詞(代序)〉，《龍川詞校箋》，頁1-14等等。而關於前者，簡單的參考可看鄭振鐸，〈南宋詞人〉，《小說月報》20.11(1929.12):1839-1872；王熙元，〈論婉約與豪放詞風的形成〉，《國文學報》5(1976.6):243-252；徐師信義，〈詞的詩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古典文學(第四集)》(台北：學生書局，1982)，頁221-239；顏崑陽，〈論宋代「以詩為詞」現象及其在中國文學史論上的意義〉，《東華人文學報》2(2000.7):33-67等等。至於兼備狹義廣義的綜合、周延性論述，則可看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第7章部分。

⑤ 如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台北：學海出版社，1990)，頁779-783扼要指出陳亮文論歸本於以政教事功之責任托諸文章。又如前註2中之書，皆頗引陳亮之文以箋注其詞。似此皆已見及陳亮文學與政治思想的互滲，很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本文試圖藉由陳亮詞作中所流露的情感，揭示其內心的情志狀態與思惟傾向，以幫助吾人能更認識其睿智與情操，從而愈發地激賞、體貼其詞、其情、其人格及其政論哲思。

二、《龍川詞》中的情感類型

《龍川詞》中所呈現的情感內容，約有二大類：一是忠愛國家民族的情懷，一是文人日常生活的情致。第一類的作品雖然都是抒發忠愛之情，但是情感的形式卻又有橫肆激昂與流緬悱惻的分別。而橫肆激昂者，有的是緊密連結其政治議論而特發，有的則是緣附政治遭遇所泛生。

(一) 忠愛國家民族的情懷

1、橫肆激昂的忠愛之情

《龍川詞》裏最引人注目者，乃其中明顯「以議論為詞」之橫肆激昂的忠愛詞篇。茲舉這類連結政治議論的詞作四首，以作說明。比如其〈水調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一闕：

不見南師久，謾說北群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⑥

這首詞藉著送南宋主戰大臣之一的章德茂，出使金國向金主賀壽，而表達愛國思想與仇必可復的信念。當中安慰章德茂眼前姑且暫時性地完執行這項屈辱的任務、朝覲胡人，南宋國運如赫日般隆盛，他日結合中原志士，必將誅滅異族、重拾淪陷的河山。關於此詞，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中有云：

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

^⑥ 本文凡引陳亮之詞與文，俱見宋·陳亮，《陳亮集》（台北：鼎文書局，1978）。因詞作不多，皆見於卷17，頁206-227，翻檢容易，故下文引詞皆不註明出處及頁碼。

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耳。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⑦

他在此上陳天子，只要登高一呼，愛國志士自必響應，宋朝與漢族的實力即可激盪而出，而一舉復國。顯然地，此政論與〈水調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一詞之立意相符相通，是則此詞乃其自身向所力持不疑者，非純為應酬章德茂而虛頌溢美^⑧。

陳亮此一中原必復的信念，係得自於察情度勢，並非故作誇語以自欺欺人。如其〈念奴嬌·登多景樓〉說：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崗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疆對。

此詞描寫親登金陵多景樓眺望山川之時，慨歎此處形勢正宜出兵北伐、一舉收復河山，非僅作為防禦胡人南侵的天然屏障而已，可惜古今卻無人能識。陳亮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中亦說：

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

^⑦ 見《陳亮集》，卷1，頁2-4、6、8。

^⑧ 關於陳亮對章氏的深心欣賞和使金期望，有興趣者可再看《陳亮集》，卷19〈與章德茂侍郎〉、〈與章德茂侍郎又書〉，頁255、256。

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臣又嘗問之守城，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⑨

此書之中詳述金陵（即建業）一帶的地理形勢，建議宜因地勢之利，重新建設成一北伐基地，轉守爲攻，不必一味畏敵求和、偏安半壁。而當中所論正是前引〈念奴嬌·登多景樓〉一詞之所本。

雖然金陵地利亙古常在，但是人事卻與時推移，是故陳亮對北伐行動又心急如焚。如其〈賀新郎·寄辛幼安和見懷韻〉即歎道：

老去憑誰說？看幾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長安今餘幾？後死無讎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絃多少恨，算世間，那有平分月？胡婦弄，漢宮瑟！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絕。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龍共虎，應聲裂。

詞中感慨世事顛倒，變化至多，遲不北伐，則中原淪陷區的民衆日久不再認同南宋，轉而歸化於金朝，將使江山與金人平分；雖然世人不解乎此，可是一二同道知音仍須共勉振作，扭轉時局，煉鐵成金，以成事功。我們倘再觀其〈中興論〉之言可以更明白此詞之緣由，該文說：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況今虜首庸懦，政令日馳，拾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

⑨ 見《陳亮集》，卷1，頁16、18。

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¹⁰

陳亮於此援舉事例，明白申言中原淪陷區的民衆在世代交替下，新生者不若前輩歷經兵燹的驚懼、身遭亡國的苦痛，故日久終將在金人的懷柔下，習以爲常，無有國仇家恨的觀念，不再認同南宋，轉而歸化於金，如此一來，南宋欲收復故土勢將不可爲。除此胡漢融合漸趨成熟的不利因素外，南宋自身偏安既久，國勢日弱，實在令人擔憂。他在〈賀新郎·酬辛幼安再用韻見寄〉中即謂：

離亂重頭說，愛吾民，金繒不愛，蔓藤累葛。壯氣消盡人脆好，冠蓋陰山觀雪。虧殺我，一星星髮！涕出女吳成倒轉，問魯爲齊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斬新換出旗麾別，把當時，一樁大義，拆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欄，只成癡絕。天地洪爐誰扇鞴？算於中安得長堅鐵！淝水破，關東裂。

此詞慨歎今日中國之分裂，導因於不忍人民飽受戰亂荼毒的和平觀念下所催生的宋金和議，但自偏安以來卻造成士氣漸惰，竟然委屈求全地遣使陪侍金酋出獵陰山；此種求和於夷之顛倒錯亂、敵強我弱之形勢，不知何年始能轉變；過去之雄圖壯舉均已落空，未來人壽又能幾何，唯望有機參謀北伐以破賊。關於此詞之本旨，其〈上孝宗皇帝第一書〉有云：

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膻，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

¹⁰ 同前註，卷2，頁22。

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¹¹

此中亟言朝廷不改和議偏安以思振作北進，不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理，徒使亡國之初高昂的民心士氣因安於現況而銷鑠殆盡，且東南半壁在北方軍民的遷入下，經濟生產、天然資源亦逐漸耗竭，凡此皆使得恢復之望越來越渺茫。其說正可與此〈賀新郎〉詞相互發明。

現存《龍川詞》中，具有鮮明政治立場與主張的豪放悲壯作品，除上引四者外，尙有其他¹²。我們倘若將此類詞篇與政論文兩相對比，比如像上文的作法般，便可以發現政論文之目的旨意或內容取材皆以剖析利害、建言對策爲主，是故重在說理、敘述、分析、舉證，以條陳縷析、層層轉進¹³。至於詞作則是抒發其期盼國家、慨歎時勢、仇怨敵人、自我激勵的心情，是故重在選取意象（如「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赫日自當中」、「一水橫陳，連岡三面」、「河洛腥膻無際」、「萬里搖肢動骨」等等）、鎔裁典故（如「王謝諸人登高懷遠」、「小兒破賊」、「猶未燥當時生髮」、「涕出女吳」、「魯爲齊弱」等等），而激烈奔瀉、迴盪不已。事實上，此種詞作所奔瀉而出之情感，乃是一種在形式上筆力萬鈞、大起大伏、奔騰激昂的忠愛之情，若果真將此等感慨多氣的激烈感情寫之於政論文，則徒然干擾理智之思的清晰精確，令人忽略思惟之客觀邏輯，偏移議政定策的焦點。因此陳亮必須另藉詞這一文類，以承載、渲洩其不能於議論國是之時所暢發對南宋國族的熱愛。這當中既有說理與抒情的大別，即使兩者若干的語詞面貌相似，其目的、作用、性質亦不相同。於是可知政論文係薈萃龍川政治議論上的理智之思，這類詞則體現其政治議論下的感性之情，並非政論文的單純重複或濃縮。而陳亮自己曾說：

¹¹ 同前註，卷1，頁2、7。

¹² 如〈賀新郎·懷辛幼安用前韻〉、〈賀新郎·同劉元實葉與正陪葉丞相飲〉、〈念奴嬌·至金陵〉等等，限於篇幅，不再具引。

¹³ 關於陳亮之政論文的主要內容與修辭風格特色，可以參考張美娥，「陳亮散文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1997）。

閒居無用心處，卻欲爲一世故舊朋友作近拍詞三十闕，以創見於後來。之以方言俚語，雜之以街譚巷歌，摶搦義理，劫剝經傳，而卒歸之曲子之律，可以奉百世豪英一笑，顧於今未能有爲我擊節者耳。¹⁴

按此處所謂「近拍詞三十闕」已佚，然而從「閒居無用心處」、「以創見於後來」、「奉百世豪英一笑」、「今未能有爲我擊節者」諸語來看，當可推論應是其理智之思的政論不獲實施，於是發爲這類連結政論的豪壯感性詞篇，以期與知音神遇，從而標識其苦心孤詣的無奈悲感¹⁵。同一時代的葉適也說：

同甫集……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淤，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¹⁶

其中已明白宣稱陳亮詞文有異。至於當中「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一語，倒不是陳亮說自己刻意在詞中闡明政治主張以作爲政治宣傳的武器，而是說他竭智積慮的政論無非皆由對國家民族真摯的忠愛所驅動，基於此一忠愛的不已，才能恆常地關注時事，進而參究研擬種種對策，所以對抒陳經世濟民之情懷的詞作，遂自許自歎如此之重，而這一層曲折，也因此成爲外人所難以理解的「微言」¹⁷。於是可知這一類連結政治議論之橫肆激昂的忠愛詞篇，不是

¹⁴ 見《陳亮集》，卷21〈與鄭景元提幹〉，頁329。

¹⁵ 按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頁364謂陳亮矢志恢復不僅是一種政治主張，且已成其人生信念，故雖歷經顛覆而不渝，發之於論、形之於歌而不厭，乃是時代主題在文藝領域的變奏。此說極富啓示，特錄於此。

¹⁶ 見宋·葉適，《水心集》（台北：中華書局，1971），卷29〈書龍川集後〉，頁5。

¹⁷ 按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台北：廣文書局，1979），卷18，頁29云：「永康陳亮同父……外集皆長短句，極不工，而自負以爲經綸之意具在是，尤不可曉也」，又葉適，《水心集》，卷12〈龍川文集序〉，頁4云：「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夏承焘於《龍川詞校箋》之序中遂謂陳葉二人皆不能知同甫詞的作風，蓋龍川係自覺地將政治議論寫進詞裏去，詞之內容是政治而又不是政治語彙的堆砌，這是當時詞人所未有的作法，且從來無人將其政治議論與詞篇對讀，是以人皆懷疑陳亮之自論其詞。而張文潛，〈論陳亮詞的風格——兼述對「微言」二字的看法〉，《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988):55-56則謂夏氏誤解「微言」一語之意，此語應是葉適讚歎陳亮散文與詞中對朝廷政治措施有所褒貶沮勸、寄意深遠，在一般人認爲是流連光景的小詞中能發出與國家大計密切相關的正大議論，實難能可貴。按張氏以「微言」一語乃讚語甚是，然夏張二氏皆以龍川這類詞作具有鮮明的政治目的，直視爲以長短句爲形式的實用政論文，而此種見解，又似廣爲一般研究者所認同，則恐爲未諦。因爲龍川文集中大部分文章皆在論述政見與事功思想，觀其文更易于明白其政治思想，何必讀其語約旨深的詞作；而且同甫無一語直道其欲以詞爲政治工具，並非如白居易自言「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落實爲新樂府一系列之類的創作者，且又自謂其詞「以創見於後來」、「奉百世豪英一笑」，則顯然不是政論文之用意。蓋政論文必欲時人廣知即行，至爲正經嚴肅，絕非「後來」、「一笑」之類。故知所謂「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自負以爲經綸之意具在是」，其意乃是以詞抒陳一己志期經濟的胸懷心意，不是以詞表述經世濟民的具體主張，而陳振孫正因不能知龍川詞在於表露感性之情，反而直以政論視之，遂有「尤不可曉」之語。

括約政論所成之另一種形式的政論文，而是宣發潛藏在該具體議論中的丹忱與該議論竟遭棄置埋沒的孤憤。因此，這忠愛之情既是其理智之思的餘事，又是其理智之思的根源。而這也應是標識陳亮異於南宋一般愛國詞人的個人特殊性所在¹⁸。

《龍川詞》內橫肆激昂的忠愛詞篇，除卻前述連結政治議論一類之外，又有較傾屬於緣附個人政治之遭遇而泛生者。此二類亦可混而不別，但其間實微有小異。比如其〈滿江紅·懷韓子師尚書〉：

曾洗乾坤，問何事雄圖頓屈？著眼階除當下，又添英物。北向爭衡幽憤在，南來遺恨狂酋失。算淒涼部曲幾人存，三之一。 諸老盡，郎君出。恩未報，家何恤！念橫飛直上，有時還戢。笑我只知存飽煖，感君元不論階級。休更上百尺舊家樓，塵侵帙。

此詞感念友人韓子師。在自我調侃中，既期待韓氏能繼其先人完成北伐抗金之大業，也表達陳亮對自身深切期許的所在。又如〈水調歌頭·和趙周錫〉：

事業隨人品，今古幾麾旌！向來謀國萬事，盡出汝書生。安識鯤鵬變化？九萬里風在下，如許上南溟。斥鷃旁邊笑，河漢一頭傾。 嘆世間，多少恨，幾時平！霸圖消歇，大家創見又成驚。邂逅漢家龍種，正爾烏紗白紵，馳騖覺身輕。樽酒從渠說，雙眼為誰明！

詞中用《莊子·逍遙遊》裏大鵬徙南的寓言典故以比擬自身志圖恢復的意氣，而歎息朝臣卻群相驚怪。又如〈鷓鴣天·懷王道甫〉：

落魄行歌記昔遊，頭顱如許尚何求！心肝吐盡無餘事，口腹安然豈遠謀！ 纔怕暑，又傷秋，天涯夢斷有書不？大都眼孔新來淺，羨爾微官作計周。

此詞反語暗諷王道甫背棄昔日大志，以表明自己始終一貫不慕求榮華富貴的抱負。像這三闋詞之類的作品¹⁹，皆藉贈語友人而陳述節義志操，以抒其抱負

¹⁸ 比如唐圭璋主編，《唐宋詞鑒賞辭典》（台北縣新店市：新地文學出版社，1991），頁956說：「用詞來議論國家大事，在宋代詞壇上，陳亮是最為突出的」。而王叔珩的《陳亮政論詞選注》，其〈代序〉頁7-9亦謂一般以陳亮為辛派詞人，但其政論色彩的詞作，實有三個顯著特色：「愛國激情更鮮明更潑辣，具有強烈的鼓動性」、「國是議論更精闢更雄辯，具有明確的針對性」、「體現運用詞這一文學形式，來傳播政治觀點、社會理想的高度自覺性」。本文雖不盡同意謂陳亮直接以詞來議論政事，但其詞作中忠愛之情與政論思惟間的互滲互融，無疑是陳氏個人的重大特色。

¹⁹ 其他尚有〈念奴嬌·送戴少望參選〉、〈水調歌頭·癸卯九月十五日壽朱元晦〉、〈水調歌頭·和吳允成遊靈

之壯懷、發其牢騷之恨怨，氣力斬決、骨幹磊落，無不發露著龍川對國家民族的赤誠忠愛。雖然這類作品裏的情感內容也是忠愛之情、情感形式也是橫肆激昂，但是興發情感的外緣因素並不是緊密聯繫於某一具體的、明確的政治主張，而是泛就其政治之基本立場所導致之處境所衍生的感慨，而與政論文的关系較遠。

2、流緬悱惻的惓惓之思

《龍川詞》中又有部分作品，其情感的內容雖亦是忠愛國家民族的情懷，然而情感的形式卻非橫肆激昂，而是流緬悱惻²⁰。橫肆激昂者直接傳達忠愛的張力強度，流緬悱惻者則體現忠愛的深刻純全。二者兼存，愈發顯出龍川忠愛的專摯。例如其〈桂枝香·觀木犀有感寄呂郎中〉寫道：

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宮都足。不辭散落人間去，怕群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喚回春意，幾曾幽獨。是天上餘香賸馥，怪一樹香風，十里相續。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愁思，況東籬淒涼黃菊。入時太淺，背時大遠，愛尋高躅。

詞中自比是月宮桂子從天上散落人間，猶不與俗花爭艷，獨於晚秋欲喚回春意，雖不遇於時，終是幽獨自賞、清高自持²¹。又如〈南鄉子〉說：

風雨滿蘋洲，繡閣銀屏一夜秋。當日鞦韆何處去？溪樓，怎對煙波不淚流！天際目歸舟，浪卷濤翻一葉浮。也似我儂魂不定，悠悠，宋玉方悲庾信愁。

此詞則於秋浦風雨之夜，目睹浪濤撼舟之景，興發宋玉才志不遂之悲、庾信暮年故國鄉土之愁。上述這兩首詞採用比興手法，含蓄委婉，曲折深遠，寄託其

洞韻》、〈洞德歌·丁未壽朱元晦〉、〈祝英臺近·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三部樂·七月送丘宗卿使虜〉、〈瑞雲濃慢·六月十一日壽羅春伯〉、〈踏莎行·懷葉八十推官〉、〈三部樂·七月二十六日壽王道甫〉等等。

²⁰ 一種情感其外顯形式可以不同，比如同是男女愛情，處在不同的環境狀態時，可以表現為熱烈激情，也可以表現為含情脈脈。

²¹ 承蒙本文的審查委員告知，此詞係寄呂祖謙之作，呂與陳有姻親關係，葉適〈龍川文集序〉嘗云：「呂伯恭退居金華，同甫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為世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違子。』」而《呂東萊文集》、《呂太史外集》有與陳亮書信三十四封，《陳亮集》有與呂氏書四封，可見兩人理念雖不盡同，但情誼至深。據委員的此一發現，我們更可相信此詞非泛泛浮說，其中必有志願之所深關者，觀《陳亮集》，卷19〈與呂伯恭正字第二書〉，頁262謂：「海內知我者，惟兄一人，自餘尚無開口處。」當可得旁證。至於陳亮對呂氏尊為師長、引為摯友，以及二人學術異同，大概的參考，可看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頁65-72、433-436。

理念的執著、淹困的愁怨，而深沈頓挫地表現出對國家民族的惓惓忠愛，傳達了個人在面對有危機而人不知、有良策而人不解的大環境下，內心誠極可哀的寂寞孤獨。

然而這種悱惻流緬的詞作，其比興寄託的具體指涉並不明朗，所以往往留有詮釋的空間。例如其〈水龍吟·春恨〉：

鬧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春歸翠陌，平莎茸嫩，垂楊金淺。遲日催花，淡雲閣雨，輕寒輕暖。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寂寞憑高念遠，向南樓，一聲歸雁。金釵鬪草，青絲勒馬，風流雲散。羅綬分香，翠綃封淚，幾多幽怨！正銷魂，又是疏煙淡月，子規聲斷。

關於此詞，黃蓼園《蓼園詞選》謂：「『鬧花深處層樓』，見不事事也。『東風軟』，即東風不竟之意也。『遲日』、『淡雲』、『輕寒輕暖』，一曝十寒之喻也。好『世界』不求賢共理，惟與小人游玩，如『鶯燕』也。『念遠』者，念中原也。『一聲歸雁』謂邊信至，樂者自樂，憂者徒憂也。」這種常州詞派的說法，固然過事穿鑿，不免牽強附會²²。然而中國詩歌自古即有美人香草的隱喻傳統，且依龍川一生好言事功、自負經綸的作風來類推，此詞縱使未至於字字句句皆暗指時政，其詞旨亦誠極可能僅藉傷春之形式而別有家國時政的深恨²³。但是今日實在無法直接證明此詞的本事，所以此篇當視為優美婉麗的傷春之詞，抑或釋成另有所寓，洵屬見仁見智。

類似的詮釋歧異，也可見於〈一叢花·溪堂玩月作〉，其云：

冰輪斜輓鏡天長，江練隱寒光。危欄醉倚人如畫，隔煙村，何處鳴榔？烏鵲倦棲，魚龍驚起，星斗挂垂楊。蘆花千頃水微茫，秋色滿江鄉。樓臺恍似遊仙夢，又疑是，洛浦瀟湘。風露浩然，山河影轉，今古照淒涼。

詞中的「風露浩然，山河影轉，今古照淒涼」數語，固可視為暗寓對中原江山易主的悲恨，然而若連結此詞之前半對秋夜水村美景的描述，則亦未嘗不可釋為龍川面對永恒大自然所興起生命有限的悲感，一如羊祜峴山墮淚碑或王羲之〈蘭亭集序〉之類。其他又如〈點絳脣·詠梅月〉：

²² 此處所述黃蓼園之說及其缺失，轉引自註1姜書閣書，頁107。

²³ 如清·劉熙載，《藝概》（台北：華正書局，1985），卷4，頁111說：「同甫〈水龍吟〉云：『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言近指遠，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

一夜相思，水邊清淺橫枝瘦。小窗如畫，情共香俱透。清入夢魂，千里人長久。君知否？雨僂雲僂，格調還依舊。

此詞固可釋為平生的志節不隨環境摧殘而異，亦可逕解為情人的相思始終如一。

基本上《龍川詞》中這類悱惻流緬的作品²⁴，若必從缺乏本事考據的角度出發，直接由字面來作解釋，其情感的內容即應隸屬於下文即將論述的文人情致一類。然而文人情致一類的作品，其本身的語意比較明確而有限，不宜過度引伸，而此種悱惻流緬的詞篇，其文字本已多具言近旨遠的潛力，且前引葉適「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之語又實為不可忽略的詮釋基礎，是故將其情感的內容歸於忠愛之情懷，應該較為妥當，即使不是每首皆另有深意，當中亦必有若干關寄託深長。

(二) 文人日常生活的情致

《龍川詞》中又頗有顯與家國之思無涉的作品，這些詞篇裏的情感乃是幽秀妍麗的生活情致。

比如抒寫春日閒愁的〈眼兒媚·春愁〉：

試燈天氣又春來，難說是情懷。寂寥聊似，揚州何遜，不為江梅。扶頭酒醒爐香燄，心緒未全灰。愁人最是，黃昏前後，煙雨樓臺。

詞中透過梁朝何遜的典故、酒醒香燄及黃昏煙雨的意象，描寫元宵節前的一種寂寞心境。比如吐露秋雨幽悶的〈洞仙歌·秋雨〉：

瑣窗秋暮，夢高唐人困。獨立西風萬千恨。又簷花落處，滴碎空階，芙蓉院，無限秋容老盡。枯荷摧欲折，多少離聲，鎖斷天涯訴幽悶。似蓬山去後，方士來時，揮粉淚，點點梨花香潤。斷送得，人間夜霖鈴，更葉落梧桐，孤燈成暈。

此詞融裁化用白居易〈長恨歌〉裏原本用以刻劃唐明皇與楊貴妃愛情悲劇的詩句，表現西風滴雨、秋盡花落的傷情離緒。

²⁴ 其他尚有〈蝶戀花·甲辰壽朱元晦〉〈小重山〉(碧幕霞銷一縷紅)、〈品令·詠雪梅〉、〈醜奴兒·詠梅〉、〈七娘子·三衢道中作〉、〈漢宮春〉(雪月相投)、〈漢宮春〉(雪滿江頭)、〈新荷葉·荷花〉、〈桂枝香·巖桂花〉、〈水龍吟·松〉、〈臨江仙〉(五百年間非一日)、〈垂絲釣·九月七日自壽〉等等。

又比如〈虞美人·春愁〉：

東風蕩颺輕雲縷，時送瀟瀟雨。水邊臺榭燕新歸，一口香泥，濕帶落花飛。
海棠糝徑鋪香繡，依舊成春瘦。黃昏庭院柳啼鴉，記得那人，和月折梨花。

及〈清平樂·秋晚，伯成兄往龍興山中，意其登山臨水，不無閨房之思，作此詞惱之〉：

銀屏繡閣，不道鮫綃薄。嘶騎忽忽塵漠漠，還過夕陽村落。亂山千疊無情，
今宵遮斷愁人。兩處香消夢覺，一般曉月秋聲。

此二詞皆意旨顯豁，而用語平易之間，卻能流暢、淡遠地分別達到傾訴懷人衷曲、代言兒女相思的效果。又如述說客愁羈思的〈青玉案〉：

武陵溪上桃花路，見征騎，怱怱去。嘶入斜陽芳草渡。讀書窗下，彈琴石上，
留得銷魂處。落花冉冉春將暮，空寫池塘夢中句。黃犬書來何日許？輞川
輕舸，杜陵尊酒，半夜燈前雨。

詞的上片以陶潛的桃花源，比擬往昔美好的故鄉，下片則藉謝靈運、陸機、王維、杜甫、李商隱之事，曲折地道出淹滯他地、思歸欲隱的心情。

至於題賦離情的〈浪淘沙〉：

霞尾卷輕綃，柳外風搖。斷虹低繫碧山腰。古往今來離別地，煙水迢迢。
歸鴈下平橋，目斷魂銷。夕陽無限滿江皋。楊柳杏花相對晚，各自無聊。

詞裏將離別的慘淡溶於眼前諸般景物中，而即景以見情；而祝壽應酬的〈阮郎歸·重午壽外舅〉：

波光渺渺浸晴陂，有亭湖岸西。芰荷香拂柳絲垂，升堂獻壽卮。紅約腕，
綠侵衣，願祝屆期頤。花間妙語欲無詩，一年歌一詞。

當中所寫則是端午節在湖亭為岳父祝壽，巧妙地運用了荷紅柳綠的景物，來象徵身心健旺、年年有今日的祝福。

其他又有像是〈浣溪紗〉：「小雨翻花落畫簷，蘭堂香炷酒重添。花枝能語出朱簾。緩步金蓮移小小，持盃玉筍露纖纖。此時誰不醉厭厭！」的記載狎妓宴飲；〈采桑子〉：「桃花已作東風笑，小蕊嫣然，春色暄妍，緩步煙霞到

洞天。一盃滿瀉蒲桃綠，且共流連，醉倒花前，也占紅香影裏眠。」的描繪遊賞桃花；〈好事近〉：「橫玉叫清宵，簾外月侵殘燭。人在畫樓高處，倚闌干幾曲。穿雲裂石韻悠揚，風細斷還續。驚落小梅香粉，點一庭苔綠。」的歌詠笛聲……。

凡此傷春、悲秋、懷人、思歸、送別、酬酢、游樂、詠物等等的篇什²⁵，數量約占《龍川詞》的半數，皆即景生情、因事會心，在不同的境地裏或悲或喜，而均色澤秀麗、情味宛轉、意興深細、詞藻優美、聲韻和諧，顯然流露龍川忠愛國家民族以外的其他感情，而與一般傳統文人詩詞的情感內容大抵同調。

三、《龍川詞》情感的生命意義與政治意義

上文既明《龍川詞》中的種種情感，於此則可進而略析其情感的底蘊，從而揭示在生命上與政治上的意義，以提供在藝術特點之外另一種欣賞與評價《龍川詞》的角度，來深化我人的認識。

陳亮的忠愛之情，動人肺腑，百代之下的讀者猶然爲之激動不已，對其丹心赤誠，自必予以肯定。然而這分肯定不應只是建立在近代中國積弱所反激而來的特殊需求與心態上²⁶，也應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礎上，始能更加客觀而流行長遠。亦即也應建立在感動於一位詞人身處壯志與環境的牴牾，始終奮力堅執，不稍怯懦走作，從這當中凸顯對自我的期許與對目標無悔的專注，而充分體現出人類一己生命內在的崇高感與超越感。同時我們亦不須因爲這分肯定，遂將陳亮其他無關忠愛情懷的婉約纖麗詞篇疑爲僞作，或者全數強解爲深寓家國之意，或者逕斥爲無有多大價值的糟粕²⁷。因爲《龍川詞》內生活情

²⁵ 《龍川詞》中除卻前文所引忠愛詞篇及前註 12、19、24 所提及者外，大抵多屬此類。而王叔珩《陳亮政論詞選注》共錄 37 首，當中若干作品似與政論關係頗遠，如〈阮郎歸·重午壽外舅〉、〈彩鳳飛·壽錢伯同〉、〈謁金門·送徐子宜如新安〉、〈卜算子·壽徐子才〉、〈祝英台近·壽俞德載〉、〈青玉案〉等等，是否當視爲政論詞，應有商榷空間。

²⁶ 比如吳其昌，〈陳龍川年譜序〉，顏虛心，《宋陳龍川先生亮年譜》，頁 1-6，謂陳亮思雪祖宗戴天之仇，復中原陸沈之土，心雄志哀，義趣態度活潑前進，與中國主靜的傳統不同，使此旨得顯，則吾震旦之妖氛盡蕩。又如唐圭璋，〈民族英雄陳龍川〉，《詞學論叢》（台北：宏業書局，1988），頁 956 謂對這位將萬斛沈恨吐露在詞章上的一代民族大英雄，在此國難時期，不禁油然而興起崇拜的觀念。唐吳二氏之譽，持有民族主義的立場，皆爲當時中國局勢飄搖有感而發。

²⁷ 按疑僞之說，宗廷輔〈致應時寶書〉、毛晉〈龍川詞補跋〉已指其非是，詳見《陳亮集》（鼎文書局版），附錄三，頁 480、482、483；亦可參考鄧廣銘〈陳龍川文集版本考〉一文。而強解之論，如趙超鷗，〈龍川詞初探〉，

致的作品，乃是詞人身處各種情境中，即景即事抒發歌詠心裏的種種悲喜情感。這種現象正是人的共性，人必在涸注一生心力的對象外有所旁騖，即在面對世界形形色色的存在時為之神移，於是理性不得不暫時隱退，生命內在的豐沛感性便活躍至表面，從而表露各種的情感。其實宇宙與人性的生動豐富必然導致人類感情的多樣化，總無法只局限於某種單一的情感，否則無疑將是人性之斷傷、心靈之封閉、生命之乾枯。因此《龍川詞》裏兼具忠愛情懷與生活情致之作的事實，反而能令讀者由其對一景一物、一事一境之壯美或優美的文字描述中，情感隨之搖蕩遞生，心智得以暫時擺開自身眼前凡塵利害的糾纏，略為窺見人性的活潑和飽滿。所以這既不是與龍川豪邁性格相悖的怪異現象，又不僅止於文學家兼善諸體的巧藝與能吸收宋詞婉約豪放二派歷來發展的成績而已²⁸。

此外，再進一步來看，我們或許會以為《龍川詞》中的情感稍有理境不足的缺憾。因為真正卓越的作品乃是引導人生境界的提升，真正偉大的作家均以其所處時空之觀點來體驗、洞察、表現人生，同時更配合著嘗試解決超越其時空之永恆人生的各種問題²⁹。可是吟詠《龍川詞》抒發忠愛之作，卻強烈感受到龍川對金人鄙夷、醜詆、仇視的態度，比如宋朝是「赫日」，漢使是「萬夫雄」，而「胡婦弄，漢宮瑟」則教河洛「萬里腥膻」之類。在此態度下所活躍者，乃是對宋朝生存受威脅的不安，此不安又非生自於不忍中原文化的淪喪或民生戰亂的塗炭，而是主要來自於對宋金國際形勢變化的客觀認識與自我國族政治主權的主觀偏袒。但是十分明顯地，客觀的認識還並不足以引動像陳亮那般激昂的忠愛之情，唯有再加上主觀的偏袒方始可能，只有在內心本具的偏愛前提下，對自家國族的存在珍視無比，形勢上的了解才能引動如此強烈的危機感與幾近精神崩潰的呼喚³⁰。因此龍川忠愛之情的底蘊，諒非緣於普泛的

《浙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1982):45 謂龍川詞七十四闕渾然一體，不能分割。至於鄙斥之論，如陳華文，〈論陳亮的文風與詞風〉，頁37 謂陳亮純詠風花雪月的詞並無多大的價值，不是龍川詞的本質特色。

²⁸ 吳梅，《詞學通論》(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102 說：「龍川與幼安，往來至密，集中〈賀新郎〉三首，足見氣誼，故詞境亦近之。而如此作(按：指〈水龍吟·春恨〉)，又復幽秀妍麗，能者固無所不能也」。此即指出陳亮兼擅眾體，為詞中能手。而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頁376 亦謂純就藝術性言，陳亮婉約之作，恐怕尤出豪壯作品之上，表明他對詞具有良好的駕馭能力。

²⁹ 關於文學上的「偉大」，讀者可參考黃國彬，〈論偉大〉，《文學的欣賞》(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6)，頁24-31。當中認為偉大的作品，其條件除了具備相當長度的篇幅、起凡的想像幅度之外，更須走向靈視境界，亦即給人智慧，使人對宇宙、生命大澈大悟，而契入至美至善的永恆。

³⁰ (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說》(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頁16-20 已指出在金人奪取首都及北半部領土後，南宋屢圖收復失地而不能，士人們往往訴諸感情，不但鄙視金朝君臣，且斥為胡、

悲憫之心，而是種族意識、人己之別。在其標舉復讎大義之下，已不是維護價值理念之爭、延續文明薪傳之爭，而似乎多只是產業歸屬權之爭、國家政權興衰存亡之爭。我們可由前引的〈中輿論〉中看出陳亮的這種心理意識。該文之始雖言海內塗炭、赤子嗷嗷無告，然而實屬作文之虛說，因為既與其下所云金人「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中原人民「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略形矛盾；又對此一現象全無絲毫正面的肯定，而僅見其擔心「業歸他姓」。故知漢金文化融合、百姓所實受之民生福祉並非其立論的重心³¹。再觀其〈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之語益明，他說：

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³²

既然金人已「一切不異於中國」，而仍要儘早趁機北伐，將之徹底消滅，則可知陳亮所關注者，主要在於宋金政軍形勢的變化、民衆對國家主權認同一類的問題，並非以擔憂被髮左衽的文化理念或期待一統以安天下黎民為出發原點及奮鬥目標。因此，讀者或許無法由其忠愛之情中，再發掘出人性的博厚關懷；無法由其身處南宋特定歷史境地的感慨中，更尋繹出對普世人類社群互動的永恒理想，從而指點個人生命與人類生存的意義。正因其視野於普遍性的虛歉，使其作雖充滿英雄氣慨，卻未能臻至聖者胸次，所以雖屬佳構，卻恐難能許為偉鑄。事實上，龍川在理念超越與人生境界上的不足，非僅詞中的情感如此，在其事功思想方面亦然。陳亮一心所追求的是「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的實際政治成就，是故認為「要以適用為主」，道德義理就在事功當中，於是推尊漢唐功業，以為與三代本質居心不異，只是表現程度略有差別，而同

虜、羌、戎、夷狄，甚至犬羊、犬豕、禽獸等等；然而憑良心說，女真族可說是最敬重中華文明的北方部族，金世宗在位期間（西元 1161-1189），與宋修好，崇尚儒術，實現三十年治世，號稱「虜中小堯舜」，而金朝首都「中都」也是相當繁榮奢侈的；至於范成大嘲笑金朝館伴使不學無術一事，只是在形同軟禁下所見未廣的個案，並不能代表金朝官場的全貌。據吉川氏的此一觀察，可見在金朝統治之下，中國北方實是個頗為文明的社會，而陳亮的表現，則當與南宋士人們同樣帶有情緒上的偏私反應。

³¹ 夏健文，「南宋永嘉永康學派之經世致用論」（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1），頁 220-224 在彙整學者的見解後，亦已作出結論，謂陳亮和永嘉諸子雖同以經世致用為學問之核心，但二者的差異，主要在永嘉諸子都能兼顧政事、厚生、軍事各方面的問題，而陳亮卻明顯忽略厚生問題的探討，帶有過分重視事功成敗，忽略義理是非的傾向。

³² 見《陳亮集》，卷 1，頁 4。

時代的朱熹則不表同意，二人遂頗有爭論³³。對此，清代的黃宗羲曾加以總結說：

止齋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于僕區不遠。」蓋謂二家之說，皆未得當，然止齋之意，畢竟主張龍川一邊過多。夫朱子以事功卑龍川，龍川正不諱言事功，所以終不能服龍川之心。不知三代以上之事功與漢唐之事功迥乎不同。當漢唐極盛之時，海內兵刑之氣必不能免，即免兵刑，而禮樂之風不能渾同。勝殘去殺，三代之事功也，漢唐而有此乎？其所謂功有適成、事有偶濟者，亦只漢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統天下而言之，固未見其成且濟也。以是而論，則言漢祖唐宗不遠于僕區，亦未始不可。³⁴

此即謂在政治實務之上，尚須有最崇高的政治理念以為引導、作為目標。須知政治不是為了打造一部超級的國家機器以絕對穩定地運作著，不是只求政權存續、人民生息而已，而是要達到三代的理想典範，形成一物質與精神普遍皆善皆美的社會才是究竟。黃氏在這裏確立事功的工具性、暫態性與道德的目的性、永恆性，因此他要批評陳亮過早地停頓於政治理性，遂將事功局限在初步的政治任務與成就，而尚未臻至政治理念的崇高層次，不知應再不斷地深化、提高政治的內容，以達致人間群體的最高福祉³⁵。

然而，縱使陳亮有所偏頗，吾人亦應當同情其目睹國勢岌岌的先知焦慮，實已無暇論及任何不切現實的高遠理念，而激賞其情之激昂專注。正猶如司馬長風對抗日時期中國詩壇之創作有流為抗戰八股的現象時，曾加以評論說：「當整個的民族，被戰火拖到死亡邊緣，觸目屍骸，充耳哭聞的情景，講上述的話，（按：指徐遲、艾青等人為有人指責抗戰詩是『八股』時的聲辯，以為詩人須忠於時代，而當前最大事件即抗日，不能隱瞞此事件之存在，故一切個人哀歎、

³³ 有關此事的基本原始文獻，可見於《陳亮集》，卷20，頁273-315所收錄之朱、陳二人的通信。而引語亦分別出自此卷〈又甲辰秋書〉，頁281，及〈又乙巳春書之一〉，頁287。另外，對於陳亮的學術思想，本文限於篇幅，於此不能詳細疏釋，一分持平又不失深度與廣度之較簡要的討論，可以參考鄭吉雄，〈陳亮的事功之學〉，《臺大中文學報》6(1994):257-290。唯鄭氏以陳亮特重歷史文化而與章學誠同一思路，則尚可再商榷。

³⁴ 見清·黃宗羲，《宋元學案》〈龍川學案〉，《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冊5，頁224。

³⁵ 關於此點，讀者可參考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台北：學生書局，1980），頁211-269。此中精闢解釋了陳亮學說只具歷史判斷而欠缺道德判斷，不能成就進化歷史之大任。

歡喜、空虛遐想……，皆成多餘），實在一點也不過分。縱然混淆文學和宣傳，是可悲的錯誤，但實在是難免的謬誤。對那一代為民族存亡流血灑淚的作家，我們只有掬誠禮敬。」³⁶準此，我們對陳亮詞中流於醜詆胡人、急倡北伐係身處於一自身之國權家業興衰生死關鍵的時代立場，便不宜再苛責其心胸不夠寬大、眼光未及於崇高的至善境界了。

同時，更重要的是，就在看似有限與不足之下，實則閃爍著陳亮的睿識與赤忱，而為政治人物所尤當具備者。所謂睿識，主要即在陳亮充分意識到政權政體的合理性問題。我們知道政治是藉由一套權力分配的結構來處理眾人的事務，因此其成立的基礎仰賴客觀環境的物質現實與群居生活的精神文化。前者比如強大的武力後盾、傑出的領袖魅力、經濟利益的分霽等等；後者則是身處其中的人，對於一切政治規範、觀念、感情、態度、評價等等，所形成的基本共識；此兩者又互相影響，彼此滲透。一旦兩者出現危機，那便是執政者所應優先處理的迫切問題，否則即將無政可從矣。而由前引的龍川詞篇與政論文裏，均可見其於敵我實力數十年來的消長變化，及宋金兩國內部民族、政權認同的微妙轉移傾向，皆深入其間、百般致意。是則陳亮顯然深諳構成政治的合理性基礎乃是政權生死存亡的赤裸現實而不容迴避，故說出「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哉」的警語³⁷，而能不迷惑於國際和平的溫情與文化共生的高調，撇清幻想性的偉大理念與不當憧憬。因此，當他堅執事功首出於義理、高喊積極北伐，正是緊扣住政治的第一序要諦，真正務實地觸及政治之所以為政治而異於世間其他學問的殊性本質。其政治眼光的犀利、政治思惟的冷靜，著實令人敬佩。至於他對自身家國的赤忱，既得睿智的支撐，則非盲目無知的偏執狂熱，而是清晰意識內的忠愛情操。此種情操，不是來自理性思惟後的產物，乃是忠節觀念完全內化於其心術的人格涵養，所自然迸發的親厚與精誠。這在前引諸詞中對南宋的鍾愛與金朝的敵愾，當已充分可見。而此一人格情操的重要性，實不下於政治上的睿識。從政者唯有具備此點，方能保證其睿智確實有益於國於民，不稍走作、變質為營私或叛亂的權謀邪智。因此倘若陳亮只有鋒芒畢露的政論文，卻無情意偏剛、不容自己的忠愛詞篇，則其人將不足以

³⁶ 見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下冊，頁182。

³⁷ 引語見《陳亮集》，卷20〈又乙巳春書之一〉，頁286。

證知其內心人格世界的真實樣態³⁸。

身處八百多年後的我們，目睹此刻台灣的政治社會，應該會對陳亮的睿智與赤忱，更有一番深刻的感同身受。自政府遷台以來，兩岸軍事、經濟實力的逐漸消長，及人民對國家之政治認同、疆域之範圍觀念、文化之歸屬感的轉移，導致今日統獨紛爭、族群對立的嚴重問題。而在政壇人物眾口一聲地標榜「愛台灣」之下，倘若剝除包裹其個人私欲、成見的糖衣後，恐怕殘剩不了多少關心此片土地、此間人民現況與前途的真情真愛。因此，台灣社會的基礎若欲穩如磐石而風氣祥和，政治人物實應兼備銳利的眼光與由衷的情意，猶如陳亮那般的政治睿識與家國赤忱，始克開創眼下台灣的洪福、奠定未來子孫的基業。

四、結語

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曾對陳亮《龍川文集》加以評判說：

其才辨縱橫，不可控勒，似天下無足當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趙括、馬謖狂躁僨轅。但就其文而論，則所謂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者，殆非盡妄。與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終愛重其人，知當時必有取也。³⁹

這當中所謂的「非盡妄」、「必有取」之處，誠極值得我人深省。政治是一門需要智慧與經驗的實務，因此觀摩古事和取法前哲，當為有效的策略之一。而我們發覺陳亮《龍川詞》中所透顯的諸種橫肆激昂的忠愛之情、流緬悱惻的惓惓之思、幽秀妍麗的生活情致，不只體現人心人性的崇高深純與豐富多樣性，使讀者足以搖蕩情思、洗鍊心靈；且其間所反映的政治思惟方向與個人情志狀態，亦即對國際現實的警示、國家與文化認同的注意，並處處流貫對民族無私的人格情操，正可以作為吾儕思索政治課題的啟發，從而具有重大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其義蘊實是亙古常新。

³⁸ 托克托等，《宋史》，卷436陳亮本傳，載其上書宋孝宗後，「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僅觀此條史料，我們尚可懷疑其為假意辭讓以釣譽之徒，否則何必落魄醉酒、言涉犯上。然而觀其忠愛詞篇的真情洋溢，則可確信其乃始終一貫之人。

³⁹ 見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1979），卷162，頁3202-3203。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1. 宋·陳亮，《陳亮集》，台北：鼎文書局，1978。
2. 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3. 宋·葉適，《水心集》，台北：中華書局，1971。
4.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台北：廣文書局，1979。
5. 元·托克托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6.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吳光等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
7.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1979。
8. 清·劉熙載，《藝概》，台北：華正書局，1985。

二、近人論著

1. 王叔珩選注（1996）《陳亮政論詞選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2. 王熙元（1976）〈論婉約與豪放詞風的形成〉，《國文學報》5:243-252。
3.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編（1982）《古典文學(第四集)》，台北：學生書局。
4. 司馬長風（1991）《中國新文學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5. （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1986）《元明詩概說》，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6. 牟宗三（1980）《政道與治道》，台北：學生書局。
7. 吳梅（1988）《詞學通論》，台北：商務印書館。
8. 姜書閣（1980）《陳亮龍川詞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9. 唐圭璋（1988）《詞學論叢》，台北：宏業書局。
10. 唐圭璋主編（1991）《唐宋詞鑒賞辭典》，台北縣新店市：新地文學出版社。
11. 夏承燾校箋，牟家寬注（1982）《龍川詞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2. 夏健文（1991）「南宋永嘉永康學派之經世致用論」，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3. 張文潛（1988）〈論陳亮詞的風格—兼述對「微言」二字的看法〉，《福

- 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53-56。
14. 張美娥（1997）「陳亮散文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5. 童振福（1982）《陳亮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
 16. 陳華文（1992）〈論陳亮的文風與詞風—兼談陳亮獨特詞風形成的原因〉，《浙江師大學報（社科版）》1:33-37、43。
 17. 黃國彬（1986）《文學的欣賞》，台北：遠東圖書公司。
 18. 詞學編輯委員會編輯（1983）《詞學（第二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 董平、劉宏章（1996）《陳亮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 趙超鷗（1982）〈龍川詞初探〉，《浙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40-46。
 21. 鄭吉雄（1994）〈陳亮的事功之學〉，《臺大中文學報》6:257-290。
 22. 鄭振鐸（1929）〈南宋詞人〉，《小說月報》20.11:1839-1872。
 23. 簡秀娟（1993）「辛派詞人以文為詞之研究」，中壢：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24. 顏崑陽（2000）〈論宋代「以詩為詞」現象及其在中國文學史論上的意義〉，《東華人文學報》2:33-67。
 25. 顏虛心編纂（1980）《宋陳龍川先生亮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
 26. 羅根澤（1990）《中國文學批評史》，台北：學海出版社。
 27. 蘇淑芬（1998）〈陳亮劉過詞比較〉，《東吳中文學報》4:273-315。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motions in Chen Liang's *Longchuan*

Lin, Yu-Sheng*

【 Abstract 】

Chen Liang was a man of letters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and *Longchuan* was his poetry collection. The love for and commitment to nation and the intellectual's feelings for life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emotions in the writings of this collection. His loyal love for nation includes two types: one is manifested in the form of excitation and fervor; the other is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pensiveness and sentimentality. The latter usually allows for much interpretation space. Although the writings in the former category rose from Chen Liang's political undertakings and misfortune, they were not simple copies or reproductions of his political essays. In general, Chen Liang's rational essays and lyrical poems we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The writings showing the intellectual's various feelings for daily life tended to be graceful and elegant. To sum up, the emotions in *Longchuan* exhibited human nature's richness, in particular showing Chen Liang's faithful character and his vi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regime and its people's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By reading *Longchuan*, a valuable work of literature, we can gain a perspective in learning how to situate ourselves in a political turmoil.

Key words: Chen Liang *Longchuan* emotion political essay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ung F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